

熊希龄晚年的慈善人生

熊希龄曾经在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里,担任过三个月的财政总长,八个月的热河都统,六个月的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

退出官场后,熊希龄以一名慈善家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

主持慈善救济事业

1917年9月的夏末秋初所发生的事,大概会成为熊希龄一生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因为那个时节,河北境内大雨连绵,山洪暴涨,大河漫溢,汪洋一片……放眼望去,京畿一带几成泽国。

熊希龄作为“灾民”之一,当时在天津亲历且目睹了“水决天津,淹灌全埠”,以及“难民露宿,呼号求援”的悲惨一幕。难能可贵的是,他面对大灾难,并非只是徒然叹息,而是奋起作为。

心怀悲悯的熊希龄此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赴北京,向中国银行公会紧急求助。经几番辛苦奔波,款项终于落实到位后,他即刻交京师警察厅,让他们购备粮食,尽快运津赈济。然后又马不停蹄往告政府,希望赶紧筹款,以赈济整个灾区饥民。只是熊希龄没有想到,他的建议经由财政总长梁启超、外交总长汪大燮提交国务会议讨论时,阁员们竟一致认定,必须由熊希龄出面主持赈灾方可,否则无从定义。对此,熊的第一反应是:“希龄自知不才,难以任重,何敢出以冒昧?”

但是眼前十万火急的情况明摆着:他如不出来主赈,政府就不“定

议”,如此,“则此数百万之饥民,无有全活希望”。正是鉴于此严峻情势,熊希龄经考虑后,“遂不得不勉为其难”。于是,1917年9月29日,大总统冯国璋颁发特派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的命令,次日命财政部拨款30万,交熊赶办急赈。

熊希龄在赈灾方面的才干很是突出。即以放赈言,熊事先会作周密筹划和精心部署。比如熊知道凭一己之力绝对办不成大事,所以他会及时约集捐助灾区的中外各慈善团体和机关,派代表到督办处讨论合力办赈方法等。再如洪灾和水患多有关系,所以熊希龄很重视根治水患,除了治标,更注重治本。在他的运作下,不过一年,京直各县五六百处决口均得到安全堵筑。此次救灾被视为熊投身社会慈善事业的滥觞,熊也从此确立了为社会慈善事业奋斗的终身宗旨。

据知熊希龄在赈济安抚流亡人员的赈灾工作中,收容无家可归的孤儿难童约有三百人,为此,熊成立了“慈幼局”收养这些孩子,使他们暂且得以栖身。“慈幼局”暂时缓解了需救助孩童“养”的问题。但这非长久之策,对一个孩童来说,接下来更重要的还面临“教”的问题。此时熊即呈请徐世昌,由徐商请逊位清室内务府,得以划拨北京香山静宜园设香山慈幼院,当年院舍即落成。次年开办,熊任院长。开办伊始,除设幼稚园,熊还设立有小学、中学、师范和职业学校的规模,这说明熊

是有长远眼光的。

援助留法勤工俭学女生

除了赈济难民,熊希龄还在危难时刻援助了身陷绝境的留法勤工俭学女生。

1921年9月,蔡和森、陈毅、李立三、刘明严等104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因为反对北洋政府向法国借款购买军火和强行住进中法大学,被法国当局强行遣送回国,留下来的女生熊季光、蔡畅、李志新、萧淑良等因找不到工作,完全断了生活来源,忍饥挨饿,度日如年,不得不写信给已回到上海的向警予陈述困境,请求紧急援助。

向警予此时分娩在即,且病魔缠身,接到姐妹们的求助信后,她寝食不安,一筹不展。谁能怜悯和援助这些滞留海外的学子呢?她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一个人可以援助这些海外孤儿,那就是湖南同乡熊希龄先生。当时他们赴法勤工俭学,不少人就是通过熊希龄筹款和支持才得以成行的。此时她能够想到的也只有正担任中法协会执事的熊希龄先生了。于是,她不顾自己身怀有孕,毅然挺着个大肚子,冒昧求见熊希龄,向他一一陈述了留在法国勤工俭学女生所遭遇的艰难困苦情形。

熊希龄听完向警予的陈述后,欣然慨诺出面臂助,并一再嘱咐她进京陈述于中法协会,一切援助工作全由他出面主持。

向警予因临产在即,进京不便,没有及时赶到北京。熊希龄返京后,见她没有如约前来,以为她是经济困难,立即托人带去一信催促,同时还附路费25元。

当他得知向警予因恐火车颠簸而不能来后,立即组织成立了华法学务协会,并亲自出面向政府请款,政府当即拨款10万元,用来紧急援助和救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使他们渡过了难关。

后来,在他的积极干预下,留法勤工俭学女生大部分转入中法大学学习,生活困难的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

夫妻携手共继慈善

1931年,熊希龄的妻子朱其慧因患脑溢血不幸去世。熊在丧妻的悲伤中度过三四年后,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毛彦文出现在了熊身边。毛后来不仅成为熊晚年生活中的生命伴侣,她还继朱其慧后,着力辅佐熊有序运转香山慈幼院的大小工作。

1935年2月,熊、毛的婚礼在上海举行。婚后,毛彦文践行答应过熊“尽力而为”的承诺,“事无大小,只要有关慈幼院者,莫不注意倾听,悉心协助,短时间内,对本院一切已稍有认识”。

“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熊、毛夫妇正在青岛。此前他们本计划赴北平参加香山慈幼院七月七日的“回家节”。现在因战事发生,无法赴北平,于是便辗转前往上海。却又遇淞沪战起。他们眼见我方士兵伤亡惨重,难民遍地。毛彦文回忆道,她当即便协助熊希龄与上海红十字会同人合力办理救护工作,设伤兵医院四所,难民收容所八处,救治伤兵六千余名,收容难民达两万多人。同时熊又关心一手创办的北平(京)香山慈幼院,因之电邀慈幼院第三校幼稚师范主任张雪门来沪,商讨赴长沙设分院事。商谈结果,先办幼稚师范,由雪门先生赴长沙觅校址,熊、毛随后去湘。但因在沪主持救护事宜,一时不能分身,故又电邀慈幼院二校教员张子招、周仰岐二君南下,协助雪门先生。

在毛彦文的叙事背后,可见他们夫妇二人殚精竭虑、言难尽述的艰辛付出。比如此时已是12月冬季,毛彦文考虑到熊希龄怕冷,劝他在沪过了旧历年,气候稍暖和时再走,但熊坚持立即动身。可是还没有等他俩动身赴湘,又传来南京失守的伤心消息。于是只能先匆匆赴港,打算然后转道去主持长沙分院事宜。

结果他们到港仅一周,上了年龄的熊希龄一方面劳累于艰辛奔波,另一方面受战事失利消息的刺激,竟于1937年12月25日凌晨,因突发脑溢血溘然长逝!

据《老年文汇报》

巴金入境受阻 用小说解围

1940年7月,巴金带上他的新作《秋》,由上海乘船经海防再至河内乘滇越路火车去昆明。途中还算顺利,但在云南入境时却遇上了麻烦。为首的一位杨姓官员检查巴金的护照。他的护照上写的是:李尧棠,四川成都市人,书店职员。

那位官员问道:“请问你在哪家书店做事?”“开明书店。”巴金回答。“我们要看看身份证明。”巴金十分为难地说:“很对不起,我忘记带了。”“那么请发电报给昆明开明书店,要他们复电证明。”

眼看着旅客们纷纷通过关卡进入云南了,巴金紧张得满头大汗,焦急地在行囊中翻来翻去,忽然,他找到一封上海开明书店请他转交给昆明开明书店的信。巴金急忙交给这位官员:“请您看一下,这封信能不能证明?”官员翻阅信件,见上面写着:“请你店转账,付给巴金先生稿费四

百元。”杨姓官员和另外两位检查人员将信将疑地打量着巴金。巴金又急忙从行囊中取出刚由开明书店出版的精装本小说《秋》。

对方接过《秋》,看到了书上刊印着的巴金照片和亲笔题字,惊喜地同旁边的同事低语了几句,转过身毕恭毕敬地对巴金说:“原来你是大作家巴金,实在对不起,失礼了。请您放心,我们立即妥善解决,决不会误了您的行期!”

这时,同时入境的旅客已经走完,杨某忽然热情地邀请巴金赏光到酒店用晚餐,以表示他们的歉意。席桌上,大家频频向巴金敬酒,轮番称赞巴金的小说。

“真不敢当,谢谢!”巴金说,“很遗憾,由于途中不便,不曾多带几本《秋》来赠送各位。”这场“边境受阻”风波,最终演绎成了一出“喜剧”。

据《人民政协报》崔鹤同/文